

* 院 史 *

回忆中国科学院编译局

黄 宗 甄

(科学出版社)

—

中国科学院编译局是在 1950 年 1 月正式成立的,最初定名为出版编译局,后经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批准,于同年 3 月改称为编译局。编译局首任局长是古生物学家杨钟健,他当时在南京任中央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主任,经过陶孟和与竺可桢两位副院长的推荐,报请政务院批准任命。该局设编译、出版两处,编译处先由关肇直任处长,1950 年 3 月关肇直调任院图书管理处处长后,由黄宗甄继任处长。

1952 年 4 月,办公厅副主任恽子强调任编译局副局长,不久又任命近史研究所副所长刘大年兼副局长,他于 1953 年 5 月底参加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回国以后,不再兼任副局长职务。同年 8 月任赵仲池为副局长。

出版编译局初成立时办公地点设在王府大街东厂胡同 2 号(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整理管理处),后来编译局随院本部迁至文津街 3 号(前静生生物调查所旧址),1954 年 4 月编译局迁出院部,编辑部又迁至东皇城根北街 16 号(前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旧址),出版部迁至东城帽儿胡同 6 号。

1950 年 9 月 15—25 日,出版总署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出版会议,杨钟健是会议主席团成员。会议中就国营出版业的统一分工与专业化问题,公私合营出版、发行、印刷业的调整分工合作等问题作出了决议。出版总署还建议中国科学院对上海商务印书馆和龙门联合书局的业务予以指导。10 月间院即先后邀请商务印书馆负责人谢仁冰和龙门联合书局经理严幼芝到编译局作初步商谈。因当时编译局尚在草创阶段,本身业务繁忙,仅能做到是不时介绍一些稿件给该两单位出版。刘大年在 1953 年初参加访苏代表团时,特意就出版工作访问苏联科学院有关领导,了解到苏联科学院设有出版编辑委员会,下面还设立执行机构的出版局,其任务是拟订该院的出版规划和方针任务并监督其执行情况,而真正进行日常出版业务和编辑工作的是苏联科学院出版社。它有自己的印刷厂、发行机构和健全的编辑部。这些情况也在《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资料汇编》中的苏联科学出版工作的访问记作了介绍。

1954 年 2 月,中国科学院院务常务会议决定成立编译出版委员会,由其领导和规划全院的编译出版和图书事业,暂时保留了编译局,作为该委员会正式成立前的执行机构并负责筹建科学出版社。陶孟和副院长兼任委员会主任(1960 年 4 月病逝后由竺可桢副院长兼任),杨钟健、尹达、周太玄、朱务善任副主任,赵仲池任秘书长。1956 年 5 月编译出版委员会在北京文化俱乐部举行第一次会议,郭沫若院长亲自到会发表讲话。此后,编译局的任务即告结束。该

委员会仅设立一个人数较少的办公室,由张明坦任主任。

1954年5月,在出版总署的协助和推动下,经编译局与上海私营龙门联合书局洽商公私合营事宜,决定设立科学出版社,由院与出版总署共同领导,以院为主。该社系公私合营单位,由公私双方组成董事会,董事长、社长、副社长、总编辑由公方任命;副董事长和经理由龙门书局推举。1954年8月1日科学出版社在北京正式成立。宣布杨钟健为董事长,周太玄任社长兼总编辑,赵仲池任副社长(后来又兼任副总编辑),严希纯为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杨肇熾为副总编辑(后来又兼任副社长),严幼芝(私方)任经理,于强(公方)任副经理。第一编辑室主任杨肇熾(兼),副主任陈一璠(不久改任正主任);第二编辑室主任周太玄(兼),副主任黄宗甄(不久改任正主任);第三编辑室主任严希纯(兼),副主任程克猷(私方);出版部主任许静。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又从上海接收了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的印刷厂和艺文印刷厂,并迁至北京,在通县建立了现代化的大型印刷厂。这几乎是仿照苏联科学院建成了一个规模齐全的出版机构。

二

出版编译局在1950年1月成立时,仅有十多人,经过半年多的开创性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

(一) 出版了三种由院主办的综合性学术刊物

1.《科学通报》,这是科学院综合性的机关刊物,月刊,1950年5月15日创刊,当时颇受科学界重视。

2.《中国科学》,系综合性学术刊物,季刊,1950年7月创刊,发表我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术论文。

3.《科学记录》,系与国外学术交流的刊物,季刊,1942年创刊,论文以外文发表。

(二) 出版院属各研究所的期刊

科学院当时接管了前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静生生物调查所、中国地理研究所等23个单位,经调整改组后成立20个新的研究单位,对其过去所出版的刊物亦同时予以调整。学术论文一般可在各学会、研究会所办有关学报上发表,有的学科当时还没有成立专门学会,它由编译局出版刊物,稿件由有关研究所负责编辑。如《水生生物学集刊》、《中国实验生物学杂志》、《考古学报》等。

(三) 扶助各专门学会、研究会出版期刊

为了推动各专门学会、研究会恢复或新创学术期刊,编译局于1950年2月召开了17个自然科学学会负责人和学报主编参加的座谈会,要求各学报能如期出版,由编译局资助出版经费,甚至代为出版。学报一律用中文发表,可附外文摘要。公布了“中国科学院扶助国内各重要专门学会研究会等刊行科学期刊办法”,同年4月经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第八次常务会议通过,可见国家对学会刊物出版工作的重视。至1952年,学会刊物的出版得到了较快发展,共出版了22种。

(四) 编订科学名词

关于科学名词的审订工作,新中国建立以前,前南京国立编译馆也曾做过一些基础工作,出版过十几种科学名词,不少著名的科学家参加了审订工作。比如动物学家郑作新便是该编译馆的名词编订者。建国以后,编译馆由出版总署接管,随之郑作新便由出版总署调到科学院

编译局,主持名词审订工作,同时把有关名词的档案和资料也转移过来。在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的领导下,设立了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由编译局承担自然科学名词的审订工作。编译局推选了180位专家,分别担任各学科的学术名词审订委员。工作进展很顺利,至1956年编译局工作结束时止,已出版了39种中外文对照的科学名词。

(五) 出版图书

出版书籍是编译局一项重要工作。根据分工,编译局一般不出版大学教科书。该局成立仅5个月,便收到院外申请出版的专著14种。经审查合格者,分别介绍给出版总署、商务印书馆、龙门书局予以出版。该局并公布了“中国科学院刊行专门图书试行办法”,凡是由编译局出版的书籍,一律付给稿酬。初始阶段,多数著作是建国前完稿的,到了1951年出版各研究所送来的著作已达42种,还有一批经审查后,分别介绍给商务和龙门书局出版的。

中国科学院为了贯彻执行政务院及文教委员会的指示,决定刊行“现代中国科学论著丛刊”,并作为重点工作来抓。目的是让青年科学工作者系统了解现代中国优秀的老科学家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发奋努力而作出的优异成绩。编译局还为此制订了中国科学院刊行现代中国科学论著丛刊的“办法”和“编审方案”两个文件。自1951年开始,先就数学、物理、地质、生理、气象五个学科进行审查编选,取得经验后逐步扩展到其他学科。先后邀请上达五个学科的科学院专门委员和有关学会理事,分别举行座谈。在各个座谈会中产生编审小组,推选组长、副组长和秘书。每次开会,郭沫若院长、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副院长等均亲临指导。但“丛刊”的编审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费力大而进度慢。主要是专家们都很忙,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对科学家所发表过的论文,审查与筛选极为繁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仅完成丛刊中的气象学卷,分为中文和英文两个版本,于1954年正式出版。气象卷一共选出了该学科专家的代表性论文共25篇,印刷装帧精致。出版后受到著名的《自然》(Nature)周刊的好评。但其他各卷因种种原因,始终未能完成定稿工作,功亏一篑,殊为可惜。

三

编译局的工作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陆续发生了不少问题。今仅举两项荦荦大端,已够令人怵目惊心。

第一件大事是关于出版《撒尼彝语研究》的错误。这是著者马学良的一部旧稿,早在南京解放前交给商务印书馆排印的,但一直没有出版。建国后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申请出版,郭沫若院长指示,应将原稿取回,送请专家审查一次。我个人处理此事,实为麻痹大意,根据审查认可后,便作为院语言学专刊草率寄往商务印书馆排印。1951年4月出版以后,发现有重大错误。同年7月2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陆定一部长亲自致函郭院长转语言研究所罗常培所长,提出严肃批评,兹摘录如下:“中国科学院出版的语言学专刊第2种《撒尼彝语研究》的序文,对法国神父郭明德的叙述,立场是错误的。为了加强中国科学院出版物的严肃性,提议考虑具体办法,予以补救。今后中国科学院的出版工作中,亦希能有具体办法,使此类政治性的错误不致发生。”

为了纠正错误随即采取了相应措施:(一)赠书一律收回;(二)通知商务印书馆立即停售,已售之书,设法一律收回;(三)必须将该书序文除掉,由著者改写,并将该书内容整饬一遍,再考虑继续出版。此外,中国科学院以及编译局、罗常培、马学良分别作出检讨,并发表于《科学通报》1951年10月第3卷第10期。此事当然我要负重要责任,编译局的检讨由我执笔,在文

中说明我的错误所在及应承担的责任。

第二件大事是 1952 年 1 月 10 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龚育之同志所写的题为“纠正科学刊物中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倾向”一文,严肃批评了《科学通报》。文章大意是,一年来《科学通报》虽有一定的成绩,例如介绍苏联的先进科学成就,报道两年来我国工业建设和科学技术中的新创造等。但一年来有不少严重的缺点,表现出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倾向,文中举出了好些例子揭露这些缺点。在政务院的政务会议上,陆定一与李富春两人也提出《科学通报》应配合思想改造的重要意见。

《人民日报》发表了批评之后,郭沫若院长立即指示《科学通报》第三卷(1952 年)一期起,改变方针,将已排印三卷一期的稿件全部收回,重新整理后排印,并转载龚育之的批评文章和《科学通报》的自我检讨。

1 月 12 日,郭沫若院长与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吴有训副院长、编译局杨钟健局长等讨论《科学通报》的今后改进问题。1 月 13 日,陶孟和、竺可桢和杨钟健亲自访问龚育之,进一步向他征求意见,随后龚育之给《科学通报》提供了相当数量的文章。1952 年 1 月 14 日竺可桢向郭沫若院长提出需要加强《科学通报》的编辑力量,并推荐在杭州工作的许良英前来编译局工作。1952 年 6 月许良英来京报到,立即投入《科学通报》的编辑工作,同时大力加强编辑力量,使《科学通报》的编辑工作大有起色。

科学院编译局既然出了几件事,6 月 11 日经院长批推进行改组,把原有机构调整为四个室:编审室,主任杨肇熹;科学通报室,主任刘大年(兼)(此室 1952 年 10 月成立,实际工作由许良英负责,1953 年许良英任副主任);翻译室,主任关肇直;名词室,主任郑作新。

在着手改组机构的同时,决定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创办的《自然科学》(1951 年 6 月创刊,1952 年 5 月停刊,共出 12 期)与《科学通报》合并。1952 年 6 月号的《科学通报》,发表了题为“加强科学刊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一文,说明《自然科学》并入《科学通报》以后,将成为有力的团结和教育广大的科学工作者,阐述科学工作的方针、政策,讨论、组织、报道各项科学工作,尤其是介绍苏联先进科学,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工具。

1953 年 4 月 27 日再度改组了《科学通报》编辑委员会,由竺可桢副院长担任主任委员,编委有曾昭伦、王斌、周培源、恽子强、郁文、刘大年、钱伟长等人,许良英任秘书。1954 年 4 月 8 日,科学院决定成立学术秘书处,《科学通报》划归该处,遂与编译局脱钩。1957 年以后《科学通报》又演变成为主要是发表短篇的研究论文和科研简报的纯学术性的刊物了。

波涛汹涌的浪潮也影响到其他的大批期刊。1953 年以前,期刊的出版情况有较大的变化。1952 年 10 月,中文版《中国科学》中文版停刊,改出外文版,《科学记录》并入该刊,其他各专门期刊或停或并,仅保留了 18 种。到 1954 年科学出版社成立时,出版期刊总数增加到 35 种,各类图书达 133 种。“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带来了勃勃生机,科学书刊出现了再度繁荣现象,科学出版社在 1991 年出版期刊达 120 种以上,《中国科学》中外文种均分为 A、B 两辑,《科学通报》分为中文、外文两种,好些专门学报也出版英文版,各种期刊已在 76 个国家与地区进行交换和销售,大大改变了昔日闭关锁国的状态。书籍方面,1991 年出版各类图书已达 500 种以上,每次举行全国科技书籍评比时,科学出版社的图书总是高居榜首、获奖最多。

编译局的结束,已经过去了 40 年,旧事重提,无非是希望吸取昔日的经验教训,能对今后的科学出版事业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